

## 阅读“谦逊”的欧洲<sup>[1]</sup>

周云龙

对读者而言，进入一个文本的有效途径往往是解析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间的互涉关系。这个过程同时又暗示了另一个时间，即聆听故事的年代。这个时间相当于阅读的氛围、脉络，从中可以一窥读者的知识立场。关注讲述故事的年代，有助于读者用思想洞穿文本；而关注聆听故事的年代，则有助于读者用思想反思自身。

大概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不断地在现实或想象的情境中与作为文化、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也就是欧美）对话。想象的情境无非就是对相关文本的阅读、阐释，这一重要的对话方式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续，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对于中国，甚至是亚洲而言，欧洲曾经是“谦逊”的。这里所说的“谦逊”，至少包含四个层次的意义面向：第一，一种进取精神和自我批判反思的意识；第二，在文化上了解他者并向他者学习的能力；第三，政治经济层面全面超越并征服他者的行为；第四，故事讲述者“谦逊”的立场。把前三个层次的意义放在

---

[1]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C760128）及福建师范大学“文体学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漫长的欧亚关系史中，我们很容易想起它们所对应的历史时段——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对欧洲自身而言，这个历史时段是其从精神危机中走出并实现自我更新的关键时刻，现代性原则也在这个时段得以形构和表达。从一种全球的视野来看，这个时段不仅诞生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还形成了现代世界的文化观念体系。总之，这个时段基本确立了未来的全球权力格局的走向，其中暗隐的属于观念形态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也深刻地形塑了讲述、聆听这段历史的方式与视野。

1970年代中后期，沃勒斯坦与萨义德相继发表了奠定各自学术声誉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sup>[2]</sup>和《东方学》<sup>[3]</sup>，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思想转型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体系》和《东方学》分别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展示了西方霸权的构成。因此可以说，这两本著作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如果从知识谱系上追溯其西方源头，也许可以看到排在那个长长的思想家名录前面的维科，甚至还可以联想到古希腊的“审美主义”。所以，寻求修辞意义上的“第一个”意义不大，关键在于看到某种汹涌的思潮背后的时代性问题。比二人稍早，1965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唐纳德·F·拉赫出版了他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的第一、二册，在该书的“前言”里面，拉赫回顾了他最初的研究动机：

这项研究的想法萌生于25年前。当时我在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聆听了多位教授讲述的西方对于亚洲传统文化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其中T·E·恩尼斯博士（Dr. T. E.

[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nnis) 的灵活授课方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奇怪的是, 关于历史上亚洲如何影响西方的问题, 看起来似乎罕有关注。<sup>[4]</sup>

看得出, 拉赫的研究源自他对既往的历史叙述的深刻怀疑, 或者说源自一种确定无疑的假设——欧洲和亚洲的遭遇必定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 他说: “全凭当时的年少气盛, 我决定去研究亚洲对西方的影响。”<sup>[5]</sup> 由此可以猜想, 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中暗含着一种探险心理, 因为亚洲对西方的影响如何, 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才知道。当然, 等到1960年代中期, 拉赫在发表其书稿时, 应该完全有信心讨论他关注的问题了, 因为此时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激进锋芒已经几乎穿透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而西方的历史哲学领域也正在酝酿着一场“语言学转向”。从这个意义上看, 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知识贡献正好体现在他本人的学术实践与当时西方学界间的想象关系上。诚如周宁先生所指出: “拉赫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主张, 却在西方史学界后殖民主义历史理论兴起之前, 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批判意识, 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这种批判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sup>[6]</sup> 因此,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也可以归于《现代世界体系》和《东方学》所属的漫长思想序列。从前述的“谦逊”意义面向上看,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是双重的“谦逊”——故事讲述者在“谦逊”的立场上讲述一段欧洲的“谦逊”故事。

然而, 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超前”性, 使之与萨义德等人“反写”“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践有着不同的学术风貌。后者因明确借鉴了以法国为中心的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分析方法, 在整体上具有一个清晰的论述框架, 或一套理论体系可循。拉赫的研究仅暗示了思

---

[4] [美] 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现的世纪》前言, 第一册, 上, 周云龙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1页。

[5] 同上。

[6] 同上, 第51页; 参见周宁“总译序”。

想意识，显示了史料素材，但缺失了理论方法。但是，这些关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得失评价的依据均来自讲述故事的年代。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最终印证的不过是另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所谓理论方法的缺失，或者说“成在‘史实’失在‘史识’”<sup>[7]</sup>，参照的视野基本上还是欧美史学理论的变迁史。如果从聆听故事的年代着眼，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某些方面的缺失，也许正好可以促使今天的我们进行自我反思。

Traduttore, traditore. 这句意大利谚语大概可以直译为“翻译者即背叛者”。因此，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参与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那么，翻译 / 聆听故事的年代就尤其重要。

在启动对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原文”*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进行译介的项目之际，作为聆听故事的人，项目负责人周宁先生意在能够在更深广的史学基础上反思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困境。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册前面的长篇译序，似乎进一步确证了周宁先生长久以来的怀疑——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容易，然而它是对的。如果说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可疑的，那么什么理论才是可靠的呢？如何以真正的“中国思想”面对真正的“中国问题”？<sup>[8]</sup> 这些疑惑、追问与反思使我们明确地感到故事聆听者及其年代的生动在场。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中译本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承载了沉重的思想负担。“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的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的信息替代另一种语言中的整个信息，而不是单个的符码单位。这种翻译是一种转述 (reported speech)：翻译者对从另一语源接收来的信息加以重新编码和

[7] 关于这些评价，具体请参看周宁“总译序”；[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第一册，上，周云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60页。

[8]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另，经周宁先生同意，这部分的思考收入拙著《本真的幻象：中国论述与崛起的气氛》（上海三联书店，即出）的“代序”部分，谨此致谢。

转达。”<sup>[9]</sup>因此，可以说这些思想负担不仅仅来自聆听故事的人的个体思想困境，更源自译文所在的大时代脉络，它是聆听故事的年代的一个隐喻。

那么，什么才是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的“译体语”（target language）的时代脉络？

再回到译介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的原初意图，即反思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困境，就不难看到今天的我们何以如此欢迎“谦逊”的欧洲。全球化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今天的问题脉络，中国知识界当前面临的似乎是“后启蒙”时代的文化自觉命题。一个在“谦逊”的立场上讲述的“谦逊”的欧洲故事可以为之提供解构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路向。中国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在全世界引发了版本各异的“中国崛起”的故事与想象。“中国崛起论”不仅重构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语境，也重构了中国自我想象的本土情境。中国当下的诸多文化症候都在昭示着一个事实：西方“中国的崛起”论述正在或已经演变为本土“崛起的中国”论述。<sup>[10]</sup>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用高科技向全世界观众强调了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这场超豪华的表演似乎正是一个“谦逊”的欧洲所要讲述的内容。然而，它偏偏暗含着某种“本真性”的自我表征。由此，“谦逊”的欧洲立场与故事对于本土的自我想象而言，其中暗隐的思想陷阱就昭然若揭。诚如周宁先生所言：“在文化自觉的理论诉求下，西方‘后学’作为方法进入中国学术，其解构力量似乎有利于动摇西方文化霸权，却无益于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

[9] [美] 罗曼·雅各布森：《翻译的语言方面》，陈永国译，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10] 关于西方的“中国崛起论”的详细论述，可参看拙文《西方的“中国崛起论”：话语传统与表述脉络》，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中国当下“崛起”的文化症候研究，可参见拙文《图像及其标靶：艺术资本，文化权力，与“本真性”的跨文化视觉再现》，载《人文国际》，第6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

当种种‘后学’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理所当然’的流行方法，同时也成为跨文化形象学运用的‘熟能生巧’的惯用方法时，我们就有必要反思其作为方法的‘合理性’了。”<sup>[11]</sup>

严复在阅读欧洲人的著作时，“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人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严复认为，除开西方的作者们所说的诸多的‘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而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sup>[12]</sup>在西方对于富强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式的追求中，严复意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其内涵可以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公心”。<sup>[13]</sup>严复阅读欧洲的方式和眼光令人神往。遗憾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的增长数据的罗列、对比所营造的数字乌托邦，在我们阅读欧洲的视野中形成了徘徊不去的云翳。须知经验层面的数据可能只是一个宏观的、相对的甚至是空洞的指标，它极不稳定，而且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实际意义。“公心”虽然略显抽象，但它可以赋予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以温度和灵魂。陶醉于本土的经济崛起，我们可能沉湎于在“谦逊”的立场上讲述的“谦逊”的欧洲故事，把追寻“往昔的民族文化”<sup>[14]</sup>的热情越燃越高。

因为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成在‘史实’失在‘史识’”，所以在那些浩如烟海的史料素材中，我们几乎无法看到某种单一而明确的理论线索，更无从寻绎一个有效解构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模式。

---

[11]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2] [美] 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路易斯·哈茨：“序言”，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3] 同上，第165页。

[14]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Richard Philcox,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pp. 169-170.

相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为了到亚洲收获灵魂的耶稣会士们勤奋、克己、谦逊、劳碌的身影，还有未能来到亚洲的欧洲读者们对于异域知识的渴望、学习、吸收、转化的能力，更有为了到亚洲收获财富的商船、军队进取、勇敢、强硬、蛮横的姿态……从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等方面，拉赫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亚洲的知识、财富和技艺在欧洲的传播过程，同样暗示了欧洲对于亚洲的诸多知识的掌控过程。那么，究竟是亚洲影响了欧洲，还是欧洲利用了亚洲？至此，拉赫的研究动机似乎在反证着一种书写上的“意图谬误”。显然，《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那略显驳杂的文本信息的叙事裂隙中泄漏出来的意义毋宁是“谦逊”的欧洲并不仅仅是谦逊，它内在地包含着傲慢，但是其“谦逊”构成了其改写全球历史的动力那不可或缺的另一面。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事实上告诉了我们三个世纪前欧洲在全球崛起的真正秘密——文化观念上的谦逊与政治经济上的强硬的互为表里。拉赫在“谦逊”的西方立场和知识传统中为我们讲述这一秘密，那么我们如何在本土立场上阅读这个“谦逊”的欧洲故事？这一问题将有效地检验我们的学术眼界和思想能力。也许，严复在19、20世纪之交阅读欧洲的方式中已经包含了一种启示。